

《儒林外史》蕴含的安徽文化特色

姜 雪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古典文学名著,是一部饱含酣畅纯如的讽刺艺术又蕴含着浓郁的民俗文化的长篇小说。安徽独特的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语言文化等,均融在作品之中,解读《儒林外史》中这些地域文化元素,既可以看到安徽文化对《儒林外史》文本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儒林外史》的成书对安徽文化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吴敬梓;《儒林外史》;安徽文化;文本创作;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5-00103-07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古典文学名著,既饱含酣畅纯如的讽刺艺术,又蕴含着浓郁的民俗文化,不断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学者对其身上所表现的文化内涵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王超龙在《近五年〈儒林外史〉研究综述》中提到,“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视野不断开拓,努力‘研求’《儒林外史》中所赋予的文化内涵”^{[1]55},但长久以来,研究者们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书中的风俗民情及讽刺艺术的研究上,或在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上略有争议,关于作者吴敬梓在安徽的故乡生活与本书的联系方面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学术空白,实际上通过作者对安徽文化的娴熟运用,《儒林外史》中的各种谋篇布局更加合理、情节安排更加自然、人物塑造更加典型等等,使安徽文化在成书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文本创作的影响十分深远,而《儒林外史》的流传也对安徽文化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二者之间构成了相互交流促进的关系,值得对双方代表的地域文化和文学之间的学术联系和现实意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促进学科领域间的交流融合。

一、吴敬梓与安徽文化

1. 吴敬梓的安徽生活

吴敬梓,字敏轩,清代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安徽滁州全椒县的一个望族,曾在青少年时期多次奔波于故乡全椒和赣榆、南京之间,并最终定居南京,一生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三地在当时都属于安徽,一生54年,在全椒23年,在赣榆10年,在南京21年)。正是这段漫长时期中在安徽境内的种种人生经历,令作者写出了这样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这部小说耗费了他近20年的时间,直到49岁时才最终完成,从开始创作直至完稿,期间作者一直没有离开安徽境内,这使我们可以确定完全是安徽文化孕育了这样一位杰出的小说天才和这部杰出的古典名著。

此外,作者家族中人仕途通畅,是谓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在众多功成名就的前辈中,跟他关系最为密切的继父住在全椒,才学渊博又重视教育,使得年幼时期的吴敬梓便饱读诗书。加之处于安徽这个儒道佛学发源地以及文化积淀深厚的大环境下,吴敬梓得以积累了更加多的文学知识,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文字功底。此间,由于他过继的身份和幼年丧母的经历又使得其对门族起落感慨深刻,这一点在文章情节中

收稿日期:2014-06-21

作者简介:姜 雪(1992-),女,内蒙古赤峰人,保定学院中文系2010级本科生,河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指导教师马晶晶。

亦有所涉及,可以由此看出作者在安徽的身世经历对其人生观的影响。除了去南京探望父亲和后期定居南京,作者前半生几乎终日躲在书房中看一些“绮语”、“密函”,并未曾像当时的同龄人一样进行过太多远地的游学,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作者一生固守安徽,所见所闻除了安徽当地的山山水水外,最多的便是安徽行政区域内的鸿儒往来,这也是作者将创作对象最终选定在儒林身上的原因之一。所以,不管是作者哪一阶段的人生轨迹,都与安徽密不可分,安徽,不可避免地成为最终影响作者创作本书的决定性因素。

2. 繁荣的安徽文化

就本书而言,作者吴敬梓的故乡位于安徽全椒,属于滁州,也就是江淮之间的皖江文化圈,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安徽文化主要是指与本书密切相关的皖江地区文化,汪谦干认为:“皖江文化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既有同质性,又有相异性。”^[2]这说明,作者所处皖江地区有着比较深厚的文化内涵。而他青少年时期曾经访游以及后来定居的彼时的南京,在吴敬梓生活时期(1701—1754)曾作为安徽的省会而存在(1667—1760),考虑到此,也有必要将南京作为淮河文化的一部分放入安徽文化之中去考虑,也因此《儒林外史》所受到的地域文化熏陶是无法用安徽文化的任何一部分简单概括的,客观来看,应该说它完全包含于安徽文化这个大的地域文化范畴之中。在安徽文化的深刻影响下,作者的文本创作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安徽文化的印痕。

要明白安徽文化的具体内容,首先,我们要了解安徽文化有哪些表现形式。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安徽文化的表现形式有安徽地方戏之黄梅戏、徽剧新安画派、徽派版画、明清民居、祠堂、石舫,还有书中主要涉及到的徽菜、徽派建筑、徽地口语等等。这些都是安徽发展至今保存下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痕迹,也都在文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其次,我们需要知道在这种表现形式下的安徽文化特色之所在,也即它的精神内核所在。在漫长的关于安徽文化的研究历史中,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安徽文化的这些表现形式中所蕴含的文化特色究竟是什么,并一直以来缺少对这些特色的综合性的自成体系的概括。其实,对于安徽文化自身而言,它已经充分做到了自成体系并分支众多,并在各种表现形式中得以沉淀,而其中的每一种艺术形式或风俗习惯又自成态势,并各自拥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化魅力,确实难以简单片面地概括成某一种特色。但毋庸置疑的是,安徽文化的精神内核即一种相对完善的地方人文素养,这种人文素养在不断扬弃的过程中,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例如庄子、老子、曹操、曹植、曹丕、嵇康、朱熹、梅尧臣、方苞、梅文鼎、胡适、陈独秀、陶行知、朱光潜等,都是安徽凭借博大精深的文化氛围孕育而出的,即使是久负盛名的徽商也大多是亦商亦文之类,无论聚集了多少财富,心里念念不忘的仍是得个雅名,凭文人自居。吴敬梓亦是这样一位风流才子,更是凭借深厚的思想底蕴创作了这样一部不朽的经典名著。

二、《儒林外史》中的安徽文化

在《儒林外史》和安徽文化二者之间,首先是安徽文化决定了《儒林外史》大部分的素材来源,甚至决定了文章涉及的题材范围和撰写方式、行文风格,其次才是《儒林外史》成书过程中保留的安徽文化痕迹反过来对于安徽文化发展继承方面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最终二者构成了相互动态作用的关系。

1. 饮食文化

徽菜作为中国一大菜系,历史悠久,口感独特,很多菜肴做法独特,选材讲究,在如今的美食界仍占据重要地位。在《儒林外史》一书中,便涉及到很多对于饮食方面的详细描述。例如书中所列食物中大量出现的鱼(出现54次),几乎遍及全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安徽近山近水的影响,在这个鱼米之乡,鱼的做法丰富多样,是徽菜的重要组成部分,臭鳃鱼更是到安徽必吃的徽菜之一。而有的传统美食,例如在文中曾9次提到的“豆腐干”,现在仍在安徽境内盛行,例如黄山市的毛豆腐,还有茶叶炮制的豆干,都是豆腐干在安徽漫漫长史的缩影,至今依然作为必备菜品出现在各大徽菜馆的菜单上。再如第二十九回:

传杯换盏,吃到午后,杜慎卿叫取点心来,便是猪油饺饵,鸭子肉包的烧卖,鹅油酥,软香糕,每样一盘拿上来。^{[3]224}

文中各种诱人的美食如“猪油饺饵”、“鸭子肉包”且不谈,仅是这“软香糕”便是属于早年间老南京夏令汉族风味糕类小吃,是安徽所特有的食物,并不是随便一处就可以见到的,甚至早已绝迹的“蓑衣饼”等等。这些都带有极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且几乎都有着一段可以追究的来历,让熟悉安徽的人一看见名字就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安徽特色。

再说到饮,书中的饮品出现最多的大抵是茶、酒两样,其中更是以茶为主,涉及全文。安徽是个优质好茶的著名产地,且拥有源远流长的茶文化,直到现在,安徽的老人们喝水的时候仍习惯说成“喝茶”。黄卉认为,“茶也是《儒林外史》中的重要饮食内容,不管是家居生活、还是做买卖应酬,都少不了茶品的出现。茶是饮品,也是一种文化品位的体现”^{[4]178}。最为典型的是,作者在书中设置了大量关于茶的情节,茶具、茶房、茶亭、茶叶,这些都成为谋篇布局最常用到的素材。在书中,仅“茶”字本身就出现过358次之多,这样高的使用频率在其他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中第二回:

等他发作过了,拿一把铅壶,撮了一把苦丁茶叶,倒满了水,在火上烧得滚热,送与众位吃。^{[3]8}

这里壶是“铅壶”,茶是“苦丁”,火候是“烧的滚热”,虽皆是一笔带过,却点出了一个常用的饮茶习惯。又如第二十九回提到的:

众人吃了,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每人一碗。^{[3]25}

这里的“六安毛尖茶”,不仅是安徽产茶,且须是“雨水煨的”,可见其讲究程度,已然细化到了沏茶用水的品质。再如第四十二回中的“梅片茶”等等,仅此两种便都是有据可查的安徽特产茶种。直到现在,众所周知,茶叶经济仍在安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非安徽本土生存的人,是断不能对茶抱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的,也绝对做不到在创作中对茶的运用如此得心应手。不仅如此,安徽也是传统土酒的酿造地之一,如今拜访安徽古镇时,仍然能够看见寻常人家自酿酒用的酒缸以及下酒的腊肉。书中还有颇具特色的酿酒,例如第二十六回中的“橘酒”,这种酒仅在《儒林外史》一书中有所记录,是一种用橘子酿成的土酒,也是使得这部著作充满了安徽省井生活气息的元素之一。

通过《儒林外史》,不了解安徽文化的人足可以趁机了解到安徽地域的饮食文化,借此一窥安徽饮食传统一斑。因此,书中的饮食资源本是安徽文化给予的,但这又是个借书立名的绝好机会,实际上反过来对于了解安徽的地域文化又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 徽派建筑

在中国的几大建筑派系中,徽派建筑是很有特色的建筑。尤其是大户人家中,一局一格都颇具讲究,以庭院格局的设计为例,通常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之间,中为敞厅,两侧为室。

在《儒林外史》中,徽式建筑的风格在字里行间也是随处可见。如第六回:

看见敞厅上,中间摆著一乘彩轿,彩轿傍边竖著一柄遮阳,遮阳上贴著:“即街县正堂。”^{[3]91}

其中的“敞厅”,即属于典型徽派建筑中庭院格局的一部分,在如今对保存相对完整的徽式古村落的走访中,还可以看到黑瓦白墙、高窗闺阁的原貌,能令人想象出明清时期书香门第的高门槛、木雕梁等中规中矩的肃穆风貌,顿时有了文人墨客之乎者也的气氛。再如本回中的一个细节:

把个赵氏在屏风后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一般。见众人都不说话,自己隔著屏风请教大爷,数说这些从前已往的话。数了又哭,哭了又数;捶胸跌脚,号做一片。^{[3]96}

赵氏再急,不敢贸然闯出屏外,此处的“屏风”,已不仅是徽派建筑中最为常用的装饰物和建筑要素,也起到了推动情节的作用,巧妙地展现了在徽地家族对于女性权利自由的限制约束,与该地域的女性文化息息相关。寻访如今的安徽古村落就会了解到,在安徽曾经的时代中,女性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例如家族议事不能进正堂,只有婚丧能进宗庙等等。因此,如果本文不是将由妾转正的赵氏由屏风内写到屏风外,通过这样一个小线索,赵氏的脾气就不能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再如“辕门”、“三间门面,一路四进”、“中间悬着一轴百子图的画;两边贴着朱笺纸的对联”等都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所包括的形式,不仅都有特定的讲究说法,且其在当时的发达程度就已是令人咋舌,作者想要表现的大家范式也在这徽式建筑的黑瓦白墙间得以立时毕现。

《儒林外史》中诸如此类的描述很多,在作者的笔下,别具一格的徽式建筑已经不再是传说中的事物,而是仿佛已经以生动形象一一展现在了读者的眼前,对于了解徽式建筑以及相关的文化内涵都有很大的帮助,和现存的实物资料一起,都成为研究徽式建筑宝贵的资料。

3. 特色口语

安徽由于自身复杂的地理因素以及历史上多层次的移民冲击,是中国东南地区方言状况最为多元、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除包含客籍方言口语外,还包括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吴语、赣语、徽语等五大方言口语体系,其用语的丰富灵活性,可见一斑。

在安徽文化于本书的各种表现之中,语言运用也是十分引人注意的,众所周知,《儒林外史》以讽刺艺术而闻名,但是它的讽刺艺术能够达到如此的高度也是综合因素造成的结果,除去作者本身纯熟的语言运用能力以外,作者所选用的生动的徽地口语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为安徽留下了大量的鲜活的语言史料。如书中第十八回:

景兰江道:“冢宰么?是过去的事了!他眼下又没人在朝,自己不过是个诸生。俗语说得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那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势利的!倒是我这雪斋先生诗名大,府、司、院、道,现任的官员,那一个不来拜他?人只看见他大门口,今日是一把黄伞的轿子来,明日又是七八个红黑帽子吆喝了来,那蓝伞的官不算,就不由的不怕。……”^{[3]154}

因为其中这一句民间俗语“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的运用,整个情节都活了起来,气氛诙谐生动,人物动态传神,仅凭一语道破了官场势利行事的风气,借景兰江之口,对人走茶凉的儒林士子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用语之简洁犀利令人拍手称赞。

另外,“在光水头上钻眼——骗人”、“家贫不是贫路贫愁煞人”、“一点水一个泡”、“眼前一笑皆知己、不是区区陌路人”、“握手捏脚”、“熟知王叔和、不如临症多”、“少不得‘言身寸’”、“战抖抖的”、“骨都着嘴”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活泼亲切的口语不仅大大中和了文章的雅俗品味,少了些呆头呆脑的书生气,多了些心领神会的不言而喻,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大大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深深地影响了本书的阅读感受和行文风格。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作者首次通过《儒林外史》记录下来的徽地用语,后来才渐渐成为后世引用的素材,例如“煎盐叠雪”、“花藜胡哨”等,极大程度上保存了当时徽地用语的生动性,为徽地口语俚语的研究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4. 地名选用

作者自幼生活的地方——安徽全椒,以及成年后久居的南京(上文提到南京在该时期属于安徽),都为作者的文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地域素材,具体表现在地名选用上也对本书的创作影响明显。书中人事或许有所夸张,但故乡的地名却在文中频繁出现,比比皆是,虚实之间,很难让人脱离安徽这个自然环境仅仅去感受文本内容。例如,书中诸多章节主要的发生地都在南京,这是因为本书创作于南京,自不必说。而诸如苏州名地“莺脰湖”,南京名地“雨花台岗”、“六合县”等,已经细化到很具体的地区,这就令人玩味,书中人和事究竟是否有迹可循,扑朔迷离中想要一探究竟的感觉难免再次袭上心头。

再如滁州“乌衣镇”、“秦淮河”等地,在作者进行文本创作的时候,已经不在其范围内生活了,但通过阅读文本就能轻易发现,前半生的生活仍然在作者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尤其是秦淮河,作者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荒诞不经的一段,记忆也最为深刻,在作者的笔下,秦淮河有着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华,又有着令作者醉生梦死的人情冷暖,这使得作者对这个地方的描写也最为动情:

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喊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时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不论你走到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

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该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3]231}

在其他地方一笔带过的时候,唯有此处用去了大量篇幅,是书中极少数出色细致的景色描绘,这已经足以能够说明秦淮河在作者心目中的分量。

也正因为《儒林外史》一书对于安徽此类地域的充分的描述,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在读书之余,对这些地方进行了详尽细致的实地考察,获得了对安徽风土民情更为深刻的了解,激发了读者对于这样一种蕴含丰富的地域文化的热爱,对于日后安徽文化的发展和推广都提供了机遇和帮助。

三、安徽文化与《儒林外史》的相互影响

1. 安徽的儒林

“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对于作者而言,放弃对人生百态的广泛关注,转而独树一帜地单单将眼光放在这样一群儒士身上,这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这大概与作者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八股作文的严格培养密切相关。长期的儒场经历使得作者不仅开始进一步地否定八股文化的弊端,而且早已从中看到了儒林中人的世情百态,又加上作者晚年应科举时遭受到的“文章好人大怪”的折辱,这一切都促使他对仕途彻底失去希望和好感,而本书正是在期间写成。因此,是全椒、赣榆、南京的生命历程;从幼年时期就时时存在的对于八股文、科举制的内心深处的不满,对士子们醉心制艺的憎恶、对于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的真实批判,所有的这一切,为《儒林外史》的诞生准备出了丰富鲜活的生活素材。

并且,由本书尖锐的讽刺精神和辛辣的叙述格调,我们可以推知,作者写此书时首先想的绝非扬名立万的问题,书一落成便意味明显——它的批判范围之深之广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文学范畴,更是跨越了狭隘的地域范畴。对于作者而言,这本书中的字字句句更像是一把揭穿儒林伪面的利剑,在作者生活时代下的安徽,原是有着多少真名士值得敬仰,是渴求真正学识的读书人,然而,在这个掺杂了虚伪名利的儒林之中,又有多少人背离了“文行出处”的原则,令作者感到痛心疾首。真君子和大丈夫虽不乏其人,但力量对比悬殊明眼之人皆可见,这与作者所见社会事实紧密相连,如果不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心中所郁的发泄欲望十分迫切,很难想象作者在人生的黄昏时期可以如此酣畅地流泻出这般自然淳如的文笔。因此,安徽作为作者心中的一个典例,将作者放入其中,我们可以发现,地域虽小,却足以吞吐举国之官场百态,因此有人评本书说:“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其描述之精彩真切不言而喻。

2. 安徽文化对《儒林外史》文本生成的作用

安徽文化以其自身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吴敬梓的写作,并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安徽文化方方面面的渗透,作者在构思中的就地取材,使得《儒林外史》中的世事人情自然晓畅,又充满着安徽文化特有的精神品质。

由于安徽文化中拥有众多传统美食做支撑,书中的每一桌酒每一顿席都得以悉数罗列、如数家珍;由于安徽拥有独一无二的饮茶文化,书中得以拥有如此多随手而来的以茶为续的情节安排,给读者带来完全和谐自然的阅读体验;由于安徽拥有繁秀百态的徽派建筑,书中得以从细微处表现出如此分毫毕现的贫富差别、道尽时代扭曲的价值观;由于亲身在安徽的生活经历,作者得以在书中熟稔地运用口语俚语,在严肃的笔调中扮演了插科打诨、诙谐讽刺的角色,充满市井气息,很大程度上调节活跃了全书的气氛;由于对安徽文化的自然而然的熟悉,书中出现了如此清晰成脉络的地名分布、令作品的故事背景能够处于一个统一的地域范围内。而有这几个方面相互的配合支持,使得本书为文风格如行云流水又不着痕迹,最终成为一部优秀的古典文学著作。作品仅在对安徽文化上述几个方面的表现中,就已经明显体

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文学特性,这种文学特性是只有在某种地域文化的滋养下才能表现出来的,印着深深的地域烙印的文学特性。

生活在安徽儒林的环境背景里,作者萌生了创作《儒林外史》的想法;在安徽儒林素材丰富的前提下,作者进行了创作的实践;在安徽文化各种艺术形式的启迪中,作者得以在创作中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安徽文化对本书的生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3.《儒林外史》对安徽文化的推动作用

杨勤认为:地方文献在安徽地域文化的发展中,“为传承和弘扬安徽地域文化提供保障”、“是安徽文化研究和创新的基础”、“促进安徽人文素质的提高及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5]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体就本文而言,在安徽文化促进了《儒林外史》成书的基础之上,《儒林外史》也极大地推动了安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归功于书中所述的安徽文化现象的丰富生动性,我们才得以了解作者的故乡安徽原来是这样一个地杰人灵、文化深厚的好地方。作品内容不仅充分突显了安徽文化的精彩之处,也间接地宣扬了传统安徽文化的魅力。

在《儒林外史》中所涉及到的各种安徽文化的表现形式,例如饮食、建筑、口语、特定地名等等描述,都是对安徽文化的表现形式较为原汁原味的保留,可以作为比较可靠的文献资料展开对安徽文化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例如前文提到的《儒林外史》中所使用的一些口语,很多在本书中是唯一有迹可查的记录,在后世不仅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和发展,还在很多后世著作中作为直接引用的对象,甚至固定下来成为安徽当地的习惯用语,成为《儒林外史》推动安徽文化发展的典例之一。

除此之外,《儒林外史》至今仍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学影响力,因此,与它相关的文化现象的繁荣和研究成果,也必然会涉及到安徽文化,这也就成为推动安徽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将更容易继承安徽文化深层次的文化精髓。在如今地域文化亟待重视、难以突破的形势下,这对于安徽文化是很有现实意义、实用价值的。

四、结语

《儒林外史》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古典文学名著,在晚清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各界学者对本书的研究在近年来也是不断热化、完善化,这充分证明了作品的人文价值,需要学术界对本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以发掘出本书更为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安徽文化对于《儒林外史》的创作影响巨大,本书的精彩之处大多包含着丰富深厚的安徽文化底蕴,一字一句,都是作者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用心之作,而《儒林外史》无疑对安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仅以与《儒林外史》相关的产业发展为例,如旅游业(人文景观吴敬梓纪念馆、秦淮河、夫子庙等)就是安徽经济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儒林外史》的广为流传推动了安徽文化的发展。

在对徽地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安徽文化在《儒林外史》中的更多具体表现,其中一些细节也是安徽文化对于本书创作影响的典型,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考证。例如他在书中也写过家产被分割的人物的悲惨境遇,也部分因为自身就深恶痛绝并饱受其害的徽地的宗族制度。还有他在书中提到的戏剧文化、梨园盛况,也是徽戏在书中自然的缩影和萌芽,均值得进一步研究,诸如此类,不予详尽。

参考文献:

- [1]王超龙.近五年《儒林外史》研究综述[J].襄樊学院学报,2010(12):52-58.
- [2]汪谦干,洪永平,周翔飞.论皖江文化研究的价值[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3):75-78.
- [3]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 [4]黄 卉.论《儒林外史》的民俗文化价值[J].作家杂志,2012(11):178-179.
- [5]杨 勤.地方文献资源与安徽地域文化建设探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3):15-17.

(下转第 136 页)

参考文献:

- [1]成一农. 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究中的价值[J]. 中国地方志, 2001(1-2): 136-137.
- [2]徐珪. 明弘治《保定郡志》明弘治刻本: 卷 19 [Z]. 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 1996: 2-3.
- [3]俞汝楫. 礼部志稿: 卷 84 [O]. 文渊阁四库全书.
- [4]李媛. 明代国家祭祀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5]清会典事例: 卷四一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635.
- [6]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日记[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1741.
- [7]李培祐. 保定府治: 卷三十一[O]. 清光绪 12 年(1886)刻本.
- [8]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The Study on Ritual Activities About Baoding Fengyunleiyu-shanchuantan

Yu Sumin

(Baoding Lianchi Museum,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sacrificial altar of the Ming Dynasty called Fengyunleiyu-shanchuantan (Cloud-thunder Altar)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ast of the ancient city of Baoding. It was set up in 1375 A.D. (the 8th year in Hongwu in Ming Dynasty) and was maintained in 1732 A.D. (the 10th year of Yongzheng in Qing Dynasty). People sacrificed to thunder, clouds and Town God at this altar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re was som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ose sacrifice and etiquette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Besides cattles, goats and pigs, jade and silk were added into sacrifice. In addition, the kinds of sacrifice became more than before and the regulation of sacrifice was clearer. In summary, ritual activities in this altar ha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 on society and politics.

Key words: Fengyunleiyu-shanchuantan (Cloud-thunder Altar); sacrifice; offering; Baoding

(责任编辑 陈 静)

(上接第 108 页)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nhui in *The Scholars* Contained

Jiang Xue

(Department of Chinese,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cholars* as a profound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a full of satire earned pure like and contains the rich folk culture novels. Anhui unique food culture, architectural culture, language culture,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works. *The Scholar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elements of regional culture, we can see the influence of Anhui culture on *The Scholars* text creation, can also see *The Scholars* role of the culture of Anhui. Through the skillful use of Anhui culture, *The Scholars* in various layout more reasonable, the plot is more natural, more typical characters, so Anhui cultur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fluence on the text creation is very profound, *The Scholars* but als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of Anhui played a certain role.

Key words: Wu Jingzi; *The Scholars*; the culture of Anhui; text creation; folk culture

(责任编辑 王 作)